

难忘的历史回顾

珍贵的内幕秘闻

97.5

牵动英美首脑的抗日功臣

在一次激战中，他从日军手里救出七千余名英美联军，但战功却被人淡忘；后来他受到英美首脑撒切尔夫人、布什等人的关注……

张学良在美国



黎明前的
京沪暴动案

“特制主席用瓷”诞生记

湖南支史

一九九七年第五期（总第七十七期）

湖南衡阳珠宝城



▲ 总经理欧阳必东先生和夫人段亮量

► 中共衡阳市委书记颜永盛（左二）、衡阳市政协主席周超（左四）、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田伏隆（左一）在总经理欧阳必东（右一）、段亮量（右二）夫妇陪同下，饶有兴趣地欣赏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和湖南书画研究院院长钟增亚（左三）在其珠宝城作画



HUNANHENYANG
ZUBAOCHENG

► 宽敞、明亮的营业场地

▼ 营业员在向顾客热情地介绍商品



衡阳珠宝城是衡阳市民营企业家欧阳必东先生艰苦创业创办起来的一家独资企业，拥有资金1200万元。主要经营黄金首饰、珠宝玉器。

衡阳珠宝城座落在衡阳市的繁华街道解放路94号，经营场地达400余平方米，拥有职工80余名。店堂宽敞明亮，装修华丽，经营的黄金首饰、珠宝玉器品种齐全，质优物美，该珠宝城在经营作风上重信誉，服务热情周到，深受顾客青睐。

珠宝城总经理欧阳必东先生是一位衡阳市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不仅经营珠宝，在衡阳市还拥有一家节节高服装公司，是衡阳市商界的一位知名人士。

地 址：衡阳市解放路94号。

电 话：(0734) 8225606 8226925

公司宗旨：

质量第一 信誉第一



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湘

公司地址：湘潭县易俗河 107 国道旁

电 话：(0732) 7880389 7882598

邮 编：411228

电 挂：8936

传 真：7880389

▲ 图为湘潭市侨联副主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建湘



▲ 宽阔壮观的公司大门

▼ 现代化的设备



AMWJNXTXPFZYXGS

该公司始建于 1995 年 4 月份，占地面积 22800 平方米，生产氧化锌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化工、冶炼、医药食品、橡胶、油漆等行业，年产量 14000 吨，年产值 5600 万元，年税利 1000 万元。一九九六年度公司被评为“湖南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湘潭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质量计量信得过单位”等光荣称号和“外商投资企业重点保护单位”。

澳门万建林（湘潭）锌品发展有限公司

1997年5月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7年第5期
(总第77期)

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湖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135号

邮编：410011

电话：4405519 4405622

4405653

印刷：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8170

定价：4.98元

2A37/16

往事回眸

“特制主席用瓷”诞生记

.....王立新 (4)

陪同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陈新宪 (6)

黎明前的京沪暴动案

.....自 诚 (9)

赴朝参战途中纪实

.....文辉蜀 (15)

人物春秋

张学良在美国

.....党朝阳 (17)

毛泽东的萍乡籍老师

.....刘松洲 (22)

“佛教将军”唐生智参加北伐的内幕

.....谭崇恩 (24)

牵动英美首脑的抗日功臣

.....刘美炎 (33)

名人轶事

青年鲁迅的爱海旅程

.....程竹怀 (39)

目录

彭德怀义救薄命女

.....鄢光润(44)

“老虎县长”庸城脱险

.....柯 云(46)

冯玉祥常德息兵祸

.....李语山(48)

史海钩沉

大汉奸褚民谊受审伏法记

.....陆茂清(51)

湖南军校始末

.....洪 流(59)

三湘英杰

中国的南丁格尔—黎秀芬

.....谢德铭 魏盼勤(64)

为民主和自由付出毕生心血的萧敏颂

.....易孟醇(69)

余志宏与武大哲学系的建立

.....段启咸(73)

艺海撷英

“湘江渔父”成圣泽

.....刘秉勋(77)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翼 袁隆平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检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鲁庆昌

牵动英美首脑的抗日功臣

1942年，7000余名英美联军在缅甸仁安羌陷入日军重围，形势万分危急，上校团长刘放吾奉命前去营救。经过一番血战，联军全部获救，此举轰动英伦三岛。但刘放吾得到的只是一纸奖状。半个世纪以后，年届九旬的老人却得到了他企盼了多年的勋章，撒切尔夫夫人和布什也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黎明前的京沪暴动案

南京解放前夕，京、沪警察准备发动一场旨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个中情节错综复杂，惊心动魄。本文对鲜为人知的内幕作了详尽披露。

大汉奸褚民谊受审伏法记

抗战胜利，汪伪行政院副院长褚民谊，为开脱卖国罪责，窜通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企图以“主动输诚”的方式换取自己的苟活。在法庭上，他玩尽伎俩，百般狡辩；蒋介石也想暗中拉他一把，然而，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

青年鲁迅的爱海旅程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一位伟人，但他也是一个凡人。他在激烈鞭挞封建礼教的同时，却难以挣脱母亲强加的婚姻枷锁。在漫漫的爱海旅途中，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归宿，其间几多苦涩，几多甜蜜……

1997年5月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7年第5期
(总第77期)

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湖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135号

邮编：410011

电话：4405519 4405622

4405653

印刷：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8170

定价：4.98元

2A37/16

往事回眸

“特制主席用瓷”诞生记

.....王立新 (4)

陪同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陈新宪 (6)

黎明前的京沪暴动察

.....自 诚 (9)

赴朝参战途中纪实

.....文辉蜀 (15)

人物春秋

张学良在美国

.....党朝阳 (17)

毛泽东的萍乡籍老师

.....刘松洲 (22)

“佛教将军”唐生智参加北伐的内幕

.....谭崇恩 (24)

牵动英美首脑的抗日功臣

.....刘美炎 (33)

名人轶事

青年鲁迅的爱海旅程

.....程竹怀 (39)

目录

彭德怀义救薄命女

.....鄢光润(44)

“老虎县长”庸城脱险

.....柯 云(46)

冯玉祥常德息兵祸

.....李语山(48)

史海钩沉

大汉奸褚民谊受审伏法记

.....陆茂清(51)

湖南军校始末

.....洪 流(59)

三湘英杰

中国的南丁格尔—黎秀芬

.....谢德铭 魏盼勤(64)

为民主和自由付出毕生心血的萧敏颂

.....易孟醇(69)

余志宏与武大哲学系的建立

.....段启咸(73)

艺海撷英

“湘江渔父”成圣泽

.....刘秉勋(77)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贤 袁隆平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检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鲁庆昌

「特制主席用瓷」

诞生记

●王立新

“天下名瓷出醴陵”。

醴陵瓷器的生产历史悠久,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人杰地灵的人文优势,首创了独具一格的釉下五彩名瓷。1959年国庆十周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被选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和工人体育馆用瓷,首都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用的胜利杯也是醴陵烧制的。1964年国庆十五周年,醴陵又成批精制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国宴餐具和国家礼品瓷。尔后,毛主席的专用餐具、天安门城楼用瓷、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用瓷都指定由醴陵生产。从1958年到1975年的23年期间,醴陵连续为毛主席特制专用饭碗、茶具、烟灰缸、插笔筒和双面彩薄胎瓷碗等各类型的日常生活用瓷器。总计件数1555件,均为湖南醴陵独创的釉下五彩精品名瓷。而当年是如何设计、烧制毛主席专用瓷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从未向外界透露过,成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

东汉时期,醴陵就有大规模的陶器作坊,清代雍正七年(1729)始产粗瓷,光绪三十二年产细瓷,在继承湖南长沙窑独特的釉下彩基础上创造出釉下五彩瓷器,因其瓷质细腻、画工精美、五彩缤纷、清雅、明快而别具一格。宣统元年至民国四年(1909—1915)釉下五彩瓷先后获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南洋劝业会一等金奖、意大利博览会最优奖,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牌奖。从此醴陵瓷业蜚声中外,当时的盛况大有与景德镇并驾齐驱之势,尤以发明的釉下五彩瓷器为景德镇所不及。

1956年5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广州海屋听取中南各省的汇报时,湖南汇报团提到成立瓷业公司统管醴陵瓷业之事,毛主席当即表示说:“这好嘛,可以试办。”并详细询问了醴陵瓷业的具体情况,连瓷器的烧成温度是多少都问到了。湖南省工业厅第一副厅长杨第甫均如实作了回答。同年6月国务院正式下达(56)国四办习字第三号文件关于:“原则上同意成立醴陵瓷业公司统一管理醴陵瓷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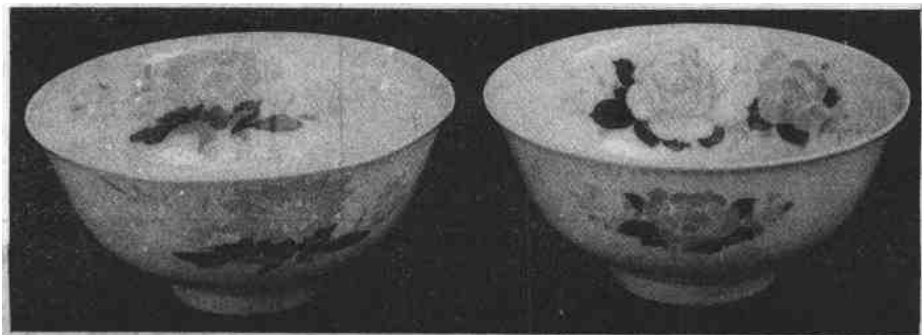
翌年3月国家轻工业部派出了以部长助理李人凤和技术司司长田银富为首的改窑小组,配合湖南省工业厅组织改窑工作组来醴陵,具体帮助进行以煤气化替代松柴烧瓷改窑试点工作,国家轻工业部在醴陵召开全国改窑工作现场会,推广了醴陵改窑的经验,为后来试制毛主席用瓷器作好了前期准备。1958年国家投资技术改造基建费800万元,在醴陵组建了专门从事釉下彩生产的

艺术瓷厂。

“胜利杯”的诞生

1958年4月11日,中共湖南省委派人到醴陵为中央首

◆醴陵特制毛主席专用瓷碗釉下五彩精品瓷碗



长试制一批茶杯(盖杯),来人带来一个延安使用过的上下一般大的桶形茶杯,这个茶杯无花、无盖、瓷质粗糙、颜色灰白。湖南省委要求在样杯的基础上改矮、扩大、加盖,并要求用最快的时间试制出样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陶瓷研究所的彩绘工程师们连续设计了六种造型设计,先后四次送长沙鉴定。6月20日,当时担任醴陵瓷器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的王林卿接长沙电话,说毛主席对醴陵试制的茶杯很满意,这时才知道是专门为毛主席制作茶杯。湖南省委要求尽快赶制40个,20个白的,20个花的,7月5日前送省委。茶杯做好了,要给杯子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幸福杯、跃进杯、解放杯、胜利杯……。最后确定一个有双关意义的名字:“胜利杯”。它象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也寓意这次试制工作的胜利。这种釉下彩绘的蝴蝶花胜利杯,其花面是由醴陵陶瓷研究所彩绘工程师林家湖根据北京审定意见设计而成的,杯底特制了有“湖南醴陵”篆书字样加一个和平鸽标志的釉上西赤红底印。从此,毛主席就正式使用了醴陵研制生产的胜利杯。

毛主席喜爱“梅花碗”

毛主席最喜爱梅花,他的《卜算子·咏梅》,歌颂梅花。梅花最可贵的品格是傲霜斗雪,风姿昂扬,它寄托着人类向困难,向逆境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醴陵设计的梅花碗造型是取明代永乐年制龙纹碗官器物造型为样本,将碗口内敛收缩改小,碗壁修薄,口径尺寸为12.5厘米,碗高6厘米,由于选用的是最优质的高岭土、石英、长石等作泥料配方,故胎质坚细、透明洁白、釉面光滑、典雅轻巧、手感舒适,碗的外边饰以三组红艳的腊梅花、衬缀一枝青竹,红绿相映,特别醒目。1966年6月毛主席秘密回到湖南住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韶山滴水洞”在一号楼休息了11天,每日亲手使用的餐具,就是醴陵特制的梅花碗和139号兰色牡丹纹官宴碗中的方肩型烟灰缸和绘有梅竹图案的瓷质插笔筒。

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醴陵艺术瓷厂生产的联合国用瓷,选用的花面图案就是毛主席最喜爱的梅花。瓷器上一朵朵艳丽迷人的红腊梅花,春意盎然地飘香于联合国大厦,中国瓷器又一次蜚声国际。

同年9月2日,湖南省委接待处肖根如来到醴陵陶瓷研究所,下达省委书记万达关于为毛主席试制釉下彩餐具和烟缸的指示。陶研所党委立即组织了工程技术人员作了认真的研究,由最擅长釉下彩花面设计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熊声贵等人,精心地设计两套不同风格的写实和变形的梅花图案的浅型三大碗和带盖加大鱼盘,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亦是最喜画各种梅花的高手,精通釉下彩绘技法。所画雪中红梅充分利用釉下彩的特殊颜

料将冰雪纷飞中的红梅画得风姿昂扬、花枝怒放,其所作红梅花薄胎莲子壶茶具和胜利杯构思巧妙,画工精良,堪称大师风貌的经典之作。

第二年的7月5日,肖根如携带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信件到醴陵艺术瓷厂订制了1210件大小碗和各种盘类产品,全部釉下彩绘梅花图案装饰,不论盘碗,一律带盖。有关中央领导明确指示要在瓷碗内画上梅花图案,要让主席在使用时也能看到他喜爱的红梅花。这批双面梅花餐具十分精美,无论图案还是瓷质,烧制工艺,都可称上乘之作,毛主席见到后高兴异常。千余件的釉下双面五彩精品瓷除派专人护送到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住处,还留下一小部分存湖南省委接待处,以便毛主席回故乡时使用。

月月红花四季开

毛主席最后一次回湖南是在1974年10月13日,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长沙,一直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到1975年2月3日,在长沙共生活了114天,这是解放以后毛主席在湖南时间最长的一次。11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布置省工交办给醴陵群力瓷厂下达了为毛主席赶制40件薄胎碗,要求内外均有釉下彩花装饰,花面的设计强调“特制瓷”的特殊意义,既要体现出最高的工艺制作水平,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要注重实用性。

《醴陵市志》彩页刊登介绍的毛主席生前用瓷之一,就是这40件薄胎碗中的主要代表件,同时也是一件最具政治色彩的瓷碗,花面的设计是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著名陶瓷美术家李小年和彩绘总工程师李人中等人。初稿设计时考虑到要有象征意义的花面,选中月季花是因它的生命力旺盛,不需特殊的养料培植,而能顽强地在野草丛中四季开花,月月有花开,天天有花看。在当时“全国河山一片红”的形势下,将饰有月季花的瓷碗取名为“月月红”可谓匠心独具。花面的色彩以红色为主调,在万物复苏的春天,百花齐放,生机勃勃。

“芙蓉国里尽朝晖”是毛主席描绘家乡的伟大诗句,四件系列之二的夏景红芙蓉釉彩碗上红艳的芙蓉花有的朝阳盛开,有的含苞待放,象征着“芙蓉国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寓意着湖南人民对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情厚意。

秋景薄胎碗手工绘制的绿叶红菊是取意于毛主席的诗词《采桑子·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金红的秋菊是收获的象征,寓意着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和革命胜利的成果。

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件套高级釉下双面彩薄胎碗用四种代表性的花卉,表现春、夏、秋、冬四季,其碗的制作工艺特别复杂,要经过36道(下转第6页)

陪同

毛

泽

东

●陈新宪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同志冒着数九寒天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并于1927年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年，我曾陪同毛泽东同志在衡山进行了为期10天的考察，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1927年1月，正当衡山地委在积极宣传贯彻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决议的时候，时任衡山地委宣传部长的我受中共衡山地委委派和地委农运部长贺尔康一道赴岳北白果，迎接并陪同毛泽东同志考察衡山的农民运动。14日，毛泽东同志偕从省城长沙返乡省亲过阴历年的戴述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从湘乡横铺经分水坳到达白果。我们四人同住圣帝庙二区农协内，当晚在区农民协会听取了负责人赵国臣

等的汇报。

到白果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同志就约集若干名岳北农工会老会员座谈，回忆岳北农工会的斗争情况。还参观了被火烧坏的农工会旧址——刘捷三公祠，即当时农工会主要负责人刘东轩房族分祠。随后毛泽东又专程去访问了寄居在白果田垅附近一位农工会烈士的母亲。刚一进门就见一位白发老人慌忙前来迎接。她听赵国臣介绍说来人是省里来的委员，泪水就止不住流下来。她边用袖襟擦自己的眼泪，边拂拭凳上的灰尘，回首仰望着身材高高的毛委员，连声说：“请坐，请坐！”接着，就忙这忙那，拿茶碗、煮鸡蛋……毛泽东同志俯身移着凳子，扶她坐下，说：“我们是来看您老人家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同志再三安慰，并

（上接第5页）釉下彩工艺才能制成瓷器，最关键的双钩上稿填色、罩色、分色分水等工艺，须有精湛技艺的釉下彩绘艺师方能胜任。釉下分水这一关的制作工艺要求，掌握颜色水份的多少，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操作，水份太少则颜色不鲜艳，水份过多则又会烧后翻色、冲泡，所以釉下彩的工艺技法相当精致巧妙，画面色彩具有水份感和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这批在“文革”期间生产的高级薄胎釉彩碗，打破了历史上瓷器底足不施釉面的制作工艺手法，传统的瓷器是底足无釉，显得粗糙。大胆的革新尝试是将坯体倒装入窑经过摄氏1360度高温烧成瓷器，再在成瓷后的碗口施上一层白色低温釉，经过摄氏700度低温窑烧制而成。这样低温烧素坯，高温烧制成瓷，低温烧釉口，“三烧制”三次进窑烧制的瓷器破损很多，成本费用亦增高，但特制专用瓷是不计成本的，只追求品质标准、完美，其画工之细致是无与伦比的，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与绚丽多彩的花面交相辉映，美不释手，是当代醴陵窑中的极品，享有“瓷中之王”的美誉，在二十世纪的近代陶瓷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制瓷工艺达到了最高水平，是研究近代陶瓷史的重要史料，也成为中外收藏家

们争相寻觅的收藏珍品。

醴陵窑所产的特制主席瓷在50年代到60年代时期的瓷器底足款是“湖南醴陵”篆书字体有黑色、兰色两种款识。“文革”期间的底印款是四方边栏正方形“中国醴陵”小篆字体青色款字和“醴陵群力”不带边框青色篆书款，是与其他各时期醴陵窑瓷器区别的一个重要鉴别特征。

中南海管理局对醴陵特制的毛主席用瓷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人民大会堂管理处于1964年国庆节后特别邀请醴陵瓷业公司、醴陵陶瓷研究所、醴陵艺术瓷厂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主席用瓷、国宴瓷制造的职工代表梁六奎等18人到北京，总结主席用瓷、国宴瓷试制的生产经验，其间有的被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举办的改编京剧《红灯记》审查观摩大会，先后又两次被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参加有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出席的文艺大会。主席瓷、国宴瓷的胜利完成，使醴陵瓷业职工享受到了国家最高的殊荣，也为醴陵瓷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辑 宇亮）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询问她家里的情况。老人说儿子当年是被“勇拐”打死在新桥的，连尸都不准收埋，破房也被烧掉了，一家人东躲西逃，好比被赶散的鸡鸭一样，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听后再三安慰，并和大家一起回忆岳北农工会的斗争经历。当我们起身告辞时，老人紧紧牵着毛委员的衣襟不放，嘴唇颤抖着想说什么，又讲不出，只是一个劲地拿着刚煮熟的四个鸡蛋往毛泽东同志手里塞。毛泽东同志推辞说：“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您老人家留着自己吃吧。”当时大家都很感动。我们随毛泽东同志辞出，一再劝老人不要送。走过一排田垌，彼此相隔很远了，只见她仍站在那里，遥望着毛委员一行，不断地用衣袖拭着双眼。毛泽东同志对我说：“你们主管宣教的应该多多进行宣传。”

在参观岳北农工会旧址和慰问烈士家属的归途中，大家都看到毛泽东同志不断用手梳理自己的头发，一边沉思，一边漫步走着。随行人员中有人问他：“湖南农民

运动为何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毛泽东同志突然抬起头，停步在大道上，左手叉腰，右手扬起食指回答说：“首先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二是我们鉴于当时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路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赵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在我离开湖南之前，湘区委从水口和安源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象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栽到铁扇公主的肚里闹腾起来，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

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这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衡山岳北爆发的原因。”

那时，各地农民协会的兴起，打灭了地主土豪劣绅的威风。农协还纷纷将旧有封建法规和农民不喜欢的事予以禁止，建立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规章。毛泽东同志来湖南考察农运前，农村已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农会自己立法，真正做到“有令即行，有禁便止”。如牌、赌、鸦片、盗匪，那些陋习都禁绝灭迹了。

我们陪毛泽东同志到福田铺考察时，17日晚住在区农民协会斜对门王春和客栈。第二天吃早饭时候，区乡农会负责人陪一位农民来向毛委员报告：这个农民有一头耕牛，上山吃草跌断了一条腿，治不好，已成废牛，请求农会允许宰杀卖掉，另买牛喂。因为衡山当时各区乡农会都严禁宰杀耕牛，违者受处罚。这位农民特来报告。毛泽东同志听后，随即问区乡农会负责人对此事的看法。区乡农会负责人众口一声，都同意这位农民宰掉这头不能耕田的废牛，另买牛喂。但又说，县农民协会也有禁令，怎么办？毛泽东同志立即回顾贺尔康和我，问道：“你们二位委员的意见呢？”贺说：“我们湘潭对宰杀病牛和废牛不禁的。”毛委员点头面向我。我说：“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为照顾农民利益，可以权宜办理。”毛泽东同志笑着对那位农民说：“两位委员都同意你们这样做，那我也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法规要合乎人情。”他接着又说，“你们农会和会员都很重视守法。”

岳北祠堂多，赵、刘、周、李、廖各姓都有总祠，分房有分祠，支房有支祠。每姓祠堂又都有族规，名目繁多。有不准妇女进祠堂参加祭祀的规定；甚至不准寡妇在祠堂大门前经过。1926年冬季，岳北女界联合会成立，决定在冬至那天利用各姓祠堂开宴祭祖的机会举行庆祝大会。白果一带平时不敢露面的未逃豪劣，也都想趁宗族祭祖团聚之日窥察动向，没料到被他们平时瞧不起的“堂客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这些堂客们结队进祠堂，用不着祠堂主事人来安席，便纷纷坐下来吃酒，使穿长袍马褂的族尊老爷吓呆了。有的强作笑颜，说什么“现在是委员世界，妇女委员理应到祠堂来祭祖。”有的见来势不对，便纷纷从侧门逃之夭夭。妇女们喝完酒，还责令祠堂管事人报帐，并要开仓查数。不查则已，一查就把经管人侵吞、挪用、贪污、舞弊的情况暴露无遗。这时区农民协会便趁机

组织公产（祠产、庙产、积谷、堤产等）清算委员会。被清算的土豪劣绅大都有侵吞、贪污、舞弊情况，农民协会便勒令其退还或罚款，并让他们戴上高帽子游乡。这不但解决了当时农民协会的经费，而且使土豪劣绅的面子扫地。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考察时，在白果赵芳三公祠听取了岳北女界联合会的汇报，并在渭水桥上看了儿童团牵着土豪劣绅游乡。看到这些，毛泽东同志连声称赞“好得很！好得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段“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帐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这样的清算运动……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写的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白果亲自调查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曾经在各地发现许多类似事件，他都以满腔的热情高度赞扬乡村贫农和妇女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在衡山地委讨论会休息时间，我和贺尔康正在棋盘酣战，毛泽东同志与向钧颇颇私语。这时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进来对大家说：“今天的县公法团联席会议上，县知事陈晖元说‘近来县财政困难税收不旺，司法收入也减少；现在年关快到了，各机关团体薪饷无法发给’，问工会农会怎么办？”向钧说“我们工会和农会又不是收税的，问我们怎么办？”这时，毛泽东同志从我们棋盘上拾起一只“帅”，对大家说“这是他在向我们将军，我们也去将他一军！”大家望着他笑，问怎么个将法？他说：“你们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县衙门既没有事干，司法衙门又无官司打，就来个裁员简政，干脆把这些冗员遣散回家，免得多吃冤枉饭。你们还告诉他，社会治安有我们的纠察队和自卫军负责，县太爷可安心睡觉。”当时衡山县知事陈晖元是唐生智的亲属，为人圆滑，表面上与工会、农会相处尚可以。县行政经费是省财政厅按预算直拨的。县团也可在征收赋税收人里坐支垫付，根本不影响工资薪饷的发放。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下次公法团会议上提出裁员简政的意见，这位县知事即表示从长计议。从此他也不再提财政困难了。（汤军田整理）

（编辑 楚文）

●自诚

黎明前的

京沪

南京解放前夕，曾发生过一起几乎改变国民党政府命运的事变，史称“京沪暴动案”。当时，南京和上海的媒体都只作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歪曲报道。但个中情节却是错综复杂，惊心动魄，鲜为人知的。

后院失火

1949年1月，蒋介石寄予厚望的“徐蚌会战”，在解放军二野、三野的联合打击下，以彻底失败告终。解放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蒋介石为稳固南京，确保东南半壁河山，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月21日宣布“下野”，随即乘飞机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奉化老家溪口镇。

蒋介石一走，“代总统”李宗仁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祥和的措施：与中共和谈，释放政治犯……而行政院长何应钦则与李宗仁唱起了对台戏：迁都广州，裁撤公务员……，一副“以战压和”的姿态。

当时，国民党政府有10几万公务员，在物价一日三涨的冲击下，生活已相当清苦，何应钦一甩包袱，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公务员成立了“南京公务人员联谊会”，屡次包围财政部，要求增发工资，改善生活。当局生怕“后院起火”，不得不发了一点遣散费。但就在这同时，国民党的达官贵人，纷纷在收拾金银细软，作南迁的准备，一时弄得人心惶惶，南京城一片混乱。

“国大代表”受命策反

南京驻防警察、宪兵足有一万二三千人。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官兵们都在找出路。从1946年内战爆发以

暴

动

案

来,河北同乡会常务理事、“国大代表”、国史馆庶务科长、共产党员田绥祥,就接受了党交给的在国统区策反军宪警的任务。

田绥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曾策反过国民党孙连仲部,并利用河北同乡的关系,做过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工作,而且私交甚笃,此时,由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部队成建制地被歼,许多军师的官多于兵,国民党政府为了消肿,把大批编余和在战场上俘虏了放回的军师长们,全部裁撤下来。于是,南京街头出现了大量成天无所事事的肩扛金星的将军们。他们也要吃饭,生存。于是,不少河北籍的军官就加入了河北同乡会。这给同乡会的常务理事田绥祥带来了极好的策反机会。

几年来,田绥祥利用河北同乡、在内政部工作的人事室主任刘荫民等“内线”,有意识地对几十名编余军官进行了安排,如中央警校毕业的刘海亭被安排到首都警察厅任督察长,不多久,又提拔为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马广运担任了保安警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南京中区警察局长。崔恒敏则当上了上海卫警总队代总队长。这些都是握有实权的职务,第一步目的达到了。

在田绥祥等人的秘密工作下,这批警官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先后加入了反对国民党而又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进步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民联”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曾策划过震动全国的国民党将官哭陵、南京警察集体罢岗、向各国驻华使领馆和高级军政官员住宅投送反对伪宪法的传单等事件,国民党当局一直无法破案。

特派员潜入京沪

1949年初,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向京沪地区秘密派遣了特派员王葆真。王潜入京沪地区后,在上海随即成立了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担任了主任委员。之后,又在南京设立了分会,以东北人孟士衡为主任委员,国史馆的胡勤业任副主任委员。胡与田绥祥在同一个单位,胡是田的顶头上司,而在党内,胡则受田的领导。孟、胡二人又直接接受王葆真的指示。

王葆真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过同盟会,民国初年曾当选过参议员,抗战中担任过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曾受李济深的派遣,以私人资格两次赴延安,先后会晤了朱德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自香港来到京沪后,则以国民党元老的身分,游说于国

民党政要之间,进行反内战宣传,并注意吸收骨干人员,扩大组织。王葆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京沪一带的国民党军警政界中进行策反,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伺机进行暴动,迎接解放军渡江,加速江南广大地区的解放。

秘密制定南京暴动计划

1949年2月5日,南京,天气阴沉,寒气逼人。

上午,七八个裹着厚厚棉衣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汇集到城东“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地下党员吴士文的家中,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在这个会上,将要制定一项在南京暴动的计划,早些时候,吴士文曾专程赴江北向解放军江北军区汇报暴动的设想。这次,江北军区特地派代表王虎臣赶来参加会议。

大家压低了嗓门,发言十分热烈,吴士文先介绍情况。他说:“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蒋介石虽然不在南京,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军政要员还在,统治中枢没有变化。我们可以象发动西安事变那样,把他们一一扣留,迫使李宗仁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主张,并立即在长江撤防。这样,蒋介石在溪口也就鞭长莫及了。暴动成功后,解放军可以兵不血刃地渡过长江,加速江南的解放,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到会者听了,都十分兴奋,几乎要欢呼起来。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表了看法。有的主张,先将国民党重要的军政机构统统炸毁,使其瘫痪;有人提出,设法召集一次军事检阅或类似的会议,在会上“一锅端”;有的人担心能不能调动这样一支部队……意见很难一致起来。

吴士文胸有成竹地说:“暴动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各方面的组织发动工作。南京城北区、中区的警察局长刘海亭和马广运已是自己人了,他们早已加入了民联,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这两个局的警力,他们完全可以控制。西区、南郊、北郊的警察局长,我们也已开始争取,只是时间问题。保警总队的官兵,大部分也向往革命,痛恨国民党,只要我们一发动,他们肯定会响应。尤其是北区警察局,国民党的五院、中央党部、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等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只要一发动,国民党中枢马上就会瘫痪。李宗仁官邸也在北区,何应钦官邸也在中区,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所能控制的全部兵力,除几个警察局的几千警力外,还有宪兵、陆军的几个团。最为有利的条件是,解放军已陈兵江北,江防军115师王天培部已经被策反,到时都会支持我们的。”

王虎臣站起来向大家表示：“我今天回去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你们在南京，一定要多与地下党联系。一旦起事，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突破江防支援你们。”

至此，与会者统一了意见，一致决定在南京举行暴动。会上，初步制定了五条计划：

一、由吴士文、王虎臣率领部分警察和游击队，直接控制南京明故宫机场和光华门外的大校场机场，切断国民党要员逃跑的退路。遇有强行通过者，即行阻击，尽量活捉。

二、发动南京军警数百人起义，切断南京各主要交通要道，断绝国民党各院部会及军事机关之间以及与李宗仁的联系。

三、起义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并占领各院部会署及官邸，务必活捉“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宪兵司令张镇、“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南京市长滕杰等人，以使其群龙无首。此项任务由北区警察局长刘海亭和中区警察局长负责执行。

四、如南京一旦出现真空状态，则立即由中共地下党领导，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或南京人民临时政府等组织机构，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重要建筑、财物。

五、全体起义警察、宪兵，在中共地下党统一指挥下，武装接应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四地区同时发动

会后，各警察局长又单独举行了秘密会商，决定将全南京市划为四个区域，届时同时发动。

第一区域，以北郊警察局为主力。起义一开始，立即占领长江南岸的制高点燕子矶，以便发挥火力，强行在江南岸形成防守的空白。此时，江北的解放军即选择燕子矶江面为突破口。必要时，由北郊警察局征集船只，直接放到江北，为解放军摆渡。这一行动，由北郊局局长“民联”成员蒋埏负责。

第二区域，控制中区、北区、西区、南郊四个警察局，以及保警总队、民众自卫队等武装，由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率领一支可靠精干的突击队，装备轻重机枪等自动火器，乘车火速赶往明故宫机场和大校场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降落。遇有国民党军政官员赴机场，立即予以扣押。考虑到机场警卫部队人数较多，装备较好，又是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嫡系部队，可能会顽抗，故决定如无法占领机场，则对机场跑道及设施进行破坏，使机场瘫痪。

第三区域，以最快速度强占南京市内的三个制高点：城西清凉山、城北挹江门、城中鸡鸣寺，配备迫击炮等重武器，居高临下控制南京城。

第四区域，南京方面枪声一响，上海方面同时发动。首先争取北站警察分局局长吴励起义，控制铁路枢纽，切断京沪交通。待分布在市内的各警局警政班同学起义后立即翦除市警察局长毛森。“民革”成员崔恒敏时任上海卫警总队代总队长，可以动员近万人的警力，由他专门负责控制全市各机关、车站、码头、企业、仓库以及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

方案议妥后，大家纷纷赶回各自所在的警局，崔恒敏立即乘当天的火车赶回上海部署。与此同时，南京“民革”分会将暴动计划向地下党作了详细汇报，并派专人到上海向“民革”总部和“民联”中央陈铭枢和郭春涛请示。

上海方面认为事关重大，坚持必须由南京方面的具体计划制定人和亲自实施者到上海详细陈述。南京方面立即派遣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赴上海。

挫败“保卫大上海”计划

上海复兴公园，万木萧疏，游人寥寥。在大门口的第五张靠背椅上，刘海亭与上海“民联”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两人坐在石椅上交谈起来。刚一说话，他们马上意识到，这么冷的天谁会坐在冰冷的石椅上说话呢？于是，两人立即步出公园，边走边谈。一会儿，来到南昌路的一幢楼房里。

上了三楼，刘海亭见到了“民联”领导人陈铭枢和郭春涛。刘说：“计划已经拟定就绪，准备也很充分，南京方面热情很高，就等动手了。”

陈铭枢处事比较谨慎，没有表态，只是说：“我看，同地下党方面商量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吧。”郭春涛也表示同意。

正巧，南京方面的地下党员田绥祥也到了上海。刘海亭立刻找到了田绥祥，在司高脱路3号田的住处，两人见面了。田绥祥从全局考虑，对刘海亭说：“你先回南京，暂不要有所动作，届时我会派人持我的亲笔信来找你们。记住，是我的亲笔信。解放军方面，由我负责联系，民革的同志积极性很高，但保密不够，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会影响起义的大局，希望你们一定要谨慎从事。”最后，双方又约定了联络暗号。

刘海亭离开司高脱路后，又去卫警总队找到了崔恒敏。崔说：“你们南京一发动，我们上海就响应，我们也与上海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崔还欣喜地告诉

刘：“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会议的绝密文件，我们已经弄到手了，已转交给地下党。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上海驻防的某国民党将军，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到时一发动，就不是我们万把人了，而是几万、十几万了！”刘海亭兴奋地说“那太好了。预祝我们马到成功。”

以王葆楨为首的上海“民革”工委，为了加强对暴动的领导，又成立了五人“决策”小组，并任命了组训、工运、军运、警运方面的负责人，还要求加强与中共地下党和“民联”的联系和配合。

京沪地区同时举行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在暴动紧张酝酿之时，南京发生了一件预料不到的突变。

突变一：《南京人报》事件

2月1日，南京的一家民办报纸《南京人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为：

“被部下在机场扭获 黄厅长开溜失风

行李装福州 司机漏消息 恼了警察长 跟踪请回来”

黄厅长是何许人也？就是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汤恩伯的心腹。

原来，蒋介石下野后，南京不少中央高级机关纷纷准备南迁，公务人员一律发给遣散费成予以裁汰。一些大官们不顾公务人员的死活，居然卷起刚刚发下的公款溜之大吉了。广大公务人员叫苦不迭。有好几个机关都出现了这样的丑闻。

首都警察厅下辖八个警察局，警员达15000多人。“徐蚌会战”后，国民党把残兵败将都调到前线去了，南京城防部队就这么万把人了。

“代总统”李宗仁为安插自己的亲信，将警察厅长黄珍吾调福州任“绥靖”副主任，则以自己人刘诚之任厅长。没想到，黄珍吾将一万多官兵养家糊口的吃饭钱，混装在行李车里，打算运往福建一走了之。不想被一名警官发觉，遂暗中盯梢，在清晨将轮胎扎破。一大早，汽车刚刚开到大街上，车胎就没气了。这位警察乘机一鼓动，把这事给捅了出来。结果人赃俱获。

事情闹出后，黄珍吾与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紧急磋商。张与黄是“陆大”校友，又是黄埔同学，关系非比一般。为防止警察哗变，张立即下令，严密封锁消息，不许走漏一点风声。

但消息还是传了出来。《南京人报》的一位女记老赵小姐闻讯后，首先赶到中区警察局采

访。之后，她以最快速度写了一篇报道。《南京人报》的一位总编辑胆小怕事，不敢开罪警方，于是就压住不予刊登。赵小姐急忙当着老总的面，向中区警察局核实，警员们众口一词，老总这才相信。于是，第二天的《南京人报》就刊出了这一条爆炸新闻。

清晨，报纸一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幸好版子未拆，又加印，又买光。这一期报纸，发行量比以往增加一倍多，达25000多份。

张耀明看到这张报纸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他想，如果这条消息一旦被证实，万把警员不稳，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立即通知各有关部门，统一口径，矢口否认这一报道。同时，又秘密下令给南京警察局刑警大队，立即派人捣毁《南京人报》社。

不多一会儿，《南京人报》就被砸得稀烂，总编、记者多人被抓。另一方面，国民党控制的宣传机器也一起鼓噪说《南京人报》拿了共产党多少多少津贴，报社有多少多少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在首都开始行动了……

突变二：联络点被破获

京沪暴动酝酿期间，南京“民革”和“民联”的同志就常在“民革”南京分会的负责人吴士文家开会。吴家是一个大杂院，住户多为政府机关人员。由于这批地下工作的同志警惕性不高，又缺乏保密工作的经验，故以此作为联络点后，没有及时变换地方，以致被一个邻居、曾在军统局工作的特务秦某盯上了。秦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监视，特别对其中几人进行了跟踪，不多久，就向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密报。而吴士文等人还蒙在鼓里。

于是，在一次举行秘密会议时，卫戍总司令部宪警突然包围了吴家，到会人员全部被捕。

破获了联络点后，国民党当局终于得知了暴动案的详情。正巧，又发生了《南京人报》事件，当局下手就有了很好的借口。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就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大肆夸张共产党策划的“南京暴动阴谋”，同时，在南京和上海展开了大搜捕。

军警特京沪大搜捕

南京方面，在逮捕了暴动的积极策划者、国民党宪兵七团通讯连上等兵肖俭魁，“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吴士文，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等人之后，当天，张耀明、黄珍吾等人还亲自组